



东方哲理诗

• 何乃英 编 •

东方文化丛书

河南文艺出版社

东方文化丛书



东方哲理诗

· 何乃英 编 ·

河南文艺出版社

东方文化丛书

东方哲理诗

何乃英 编 责任编辑 方亚平

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安阳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年9月第1版 1998年9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625

字数 313000 印数 1—4000

ISBN7-80623-084-X/I·60

定价 18.3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印度]
伐致呵利
《三百咏》





[印度]
《五卷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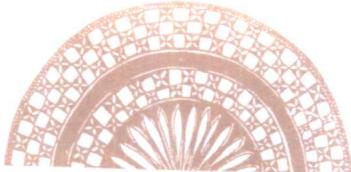


[印度]
《格比尔诗选》





[印度]
泰戈尔
《吉檀迦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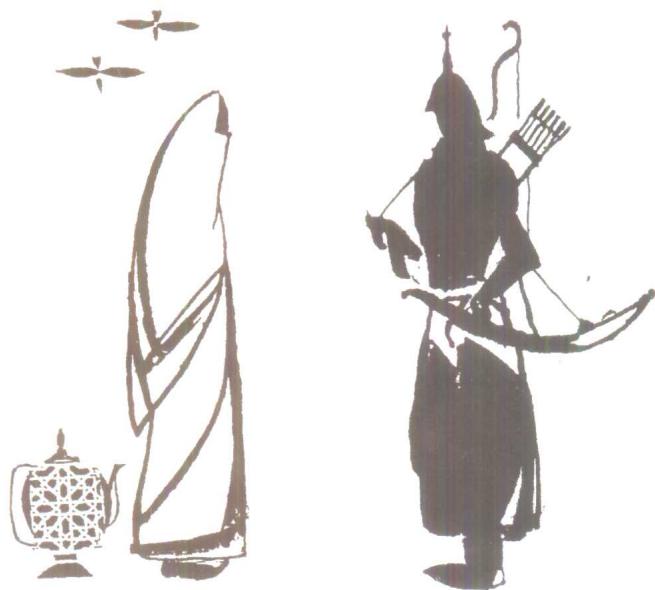


44



[印度]
泰戈尔
《飞鸟集》





[伊朗]
萨迪
《蔷薇园》





[黎巴嫩]
纪伯伦
《先知》





[黎巴嫩]
纪伯伦
《沙与沫》

东方哲理诗浅论

—

作为文学的体裁之一，诗歌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如从表现手段，可分为抒情诗和叙事诗；从表现形式，可分为格律诗和自由诗；从表现内容，可分为山水诗、爱情诗、悼亡诗、赠别诗、哲理诗等。所谓哲理诗，顾名思义是指蕴含着哲理意义的诗歌，即蕴含着诗人对于宇宙和人生原理见解的诗歌。一般来说，哲理诗往往通过对具体的、特定的事物的生动描绘，委婉含蓄地说明和阐述某种抽象的、普遍的哲理，既给人以美的感受，又使人获得教益；但有时也由诗人直抒胸臆，直接说明和阐述哲理。无论哪种情况，哲理诗都应富于哲学思辨色彩，揭示深邃隽永的道理，启人智慧，发人深思，耐人寻味，从而使读者对宇宙和人生有更深入的理解，即所谓“以理化人”。

东方的哲理诗丰富多彩，引人瞩目。这一方面是因为东方许多民族具有很强的思辨能力，自古以来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探讨诸如宇宙是如何产生的，世界是怎样发展的，特别是人生的目的何在，人生的幸福为何，人们应当确立什么样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等重大哲理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在东方许多民族的文学嬗变历程中，诗歌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取得了光辉灿烂的成就，在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于是，为数相当可观的哲理诗人和

哲理诗歌便应运而生了。众所周知，我国自《诗经》起至现代止，优秀的哲理诗不计其数，古代的只要举出苏轼描写庐山的《题西林壁》，现代的只要举出臧克家纪念鲁迅的《有的人》等名篇便可见其一斑了。除我国外，其他许多东方国家的哲理诗也历来为人称道，其中尤以印度、伊朗、希伯来、阿拉伯以及日本等国最为突出。

由于东方各国的哲理诗浩如烟海，本书篇幅有限，自然不能尽行收入。同时，为了使得本书内容不致显得过于零碎和分散，所以决定采取尽量集中选编的办法，即将印度、伊朗、希伯来、阿拉伯以及日本等国最著名、最有代表性的诗人及其作品选入（只要篇幅许可，每部作品尽量少删），以便读者“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其中日本可以算作例外，因为日本似乎没有那么突出的哲理诗人和哲理诗集，所以只好采用选入多人作品的方法。此外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哲理诗表现的是诗人对宇宙和人生原理的见解，而诗人的见解当然是不能超越其所属的民族性格、社会地位、思想意识和宗教信仰的，更何况选入本书的一大部分诗歌是属于古代的呢。因此，尽管选编者在选编过程中考虑到了这个问题，已经做了一番筛选工作，可是毕竟不可能筛选得干干净净，只有靠读者自己去仔细加以鉴别，吸取有益的东西，扬弃有害的东西了。

二

印度是东方的文明古国，也是东方的诗歌大国。印度的哲理诗数量极多，本书只能选取其中最有名的几种，即伐致呵利的《三百咏》、瓦鲁瓦尔的《古拉尔箴言》、《五卷书》、格比尔的诗歌和泰戈尔的《吉檀迦利》、《飞鸟集》。

正如许多印度古代的作家和诗人一样，关于伐致呵利的生卒年代和生平事迹都没有留下多少确实可信的材料。一般认为他是公元以后不久的人，但也有人认为他是4世纪至5世纪的人，此外

还有人认为他生活在7世纪。至于他的身份是什么，说法就更多更乱了。如有人说他是国王，有人说他是文法学家，还有人说他是佛教徒等。但从他留下的诗歌内容来看，这些身份似乎都不合适，而像是一个怀才不遇、愤世嫉俗的落魄文人。例如第4首诗写道：“能识者满怀妒意，/有权者骄气凌人，/其他人不能赏识，/好诗句老死内心。”

伐致呵利的《三百咏》是一部用梵文写的短诗集，在印度流传很广。这部诗集名为“三百咏”，其实流传下来的各种本子诗歌数量多少不一，而且差异颇大。据印度学者高善必考察，现存的写本（手抄本）多达3000种以上，刊本（印刷本）也已超过100种。他从各种传本中校出伐致呵利可靠的原作共有200首，还有可疑的152首，另有500首散见于少量的不同的写本中，三类共计852首。本书所依据的中文译本是译者金克木先生根据高善必的“精校本”翻译的，主要收入高善必认为可靠的200首，另外加了高善必认为可疑的8首。另据译者介绍，梵文原诗每首都分双行写，分四句读，但格律不同，有长有短；长的每句中间有固定的停顿，与中国的词、曲（但无衬字）体相似，而短的则像中国的绝句。原诗以长短音配格律，如中国词的平仄，可以吟唱，但没有韵脚，而常用谐音。译诗无法依据原有格律，只好全都译为四行诗并大半加上韵脚，可能时再模仿一点原诗句的格调。原诗多用比喻并好用双关语，这是印度诗歌的传统。不过由于伐致呵利的时期较早，所以他的语言仍然是质朴而自然的，不像后来有些诗人那样华而不实。

《三百咏》由三个部分组成，即由三个“百咏”组成，它们分别称为“世道百咏”、“艳情百咏”和“离欲百咏”。“世道百咏”写的是社会上的人们应当遵守的伦理道德、思想准则和行为规范之类；“艳情百咏”写的是男女的交往、女性的可爱和贪恋女色的祸害；“离欲百咏”则是劝导人们放弃世俗生活，出家修行，以便获得精神解脱。尽管诗人的观点我们无法全部接受，但是其中许多首诗仍然对于

我们不无益处。例如颂扬高贵品格的(如“恶人应当远离,/即使他有学问;/蛇顶嵌有宝珠,/难道就不伤人”),批判帝王言行的(如“又真诚,又虚假;又严厉,又甜言蜜语;/又残忍,又仁慈;又贪婪,又慷慨大方;/又不断花费,又有大量钱财滚滚来;/帝王行为像妓女,有不止一种形相”),蔑视骄横权贵的(如“你主宰钱财;我们是语文之主宰;/你是英雄;我们善于挫败论战者骄态;/财迷求你;求除智慧上污垢者从我来;/你若不尊我,我更不理你;国王啊!我走了”),批评损人利己的(如“舍己为人的人是善人,/常人为人谋而不损己,/利己而损人是人中罗刹鬼,/损人而无所利,吾不知其何名”),反对摇尾乞怜的(如“在施食者面前摇尾巴,腿跪下,/坐在地上张嘴露腹,这是狗模样;/大象却不然,先要严肃望一望,/听了无数的好言语,才肯把食享”)等便是。

二

瓦鲁瓦尔的《古拉尔箴言》是用泰米尔文写的诗集,属于印度南方泰米尔人的艺术杰作。泰米尔文文学由来已久,至今已有2500年以上的历史。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2世纪是泰米尔文学发展史上的第一个时期——桑伽姆时期,主要成果有8部诗集和10部长诗。公元3世纪到6世纪是泰米尔文学发展史上的第二个时期——伦理文学时期,主要成果有18部诗集,其中12部为伦理文学作品,以表现伦理道德问题为主旨,而瓦鲁瓦尔的《古拉尔箴言》则堪称佼佼者。

和伐致呵利的《三百咏》情况类似,《古拉尔箴言》的作者及其时代也缺乏可靠的资料。根据若干传说材料,我们只能大致推断作者生活在公元2世纪到3世纪,作者的正式名字应当是提鲁瓦鲁瓦尔,瓦鲁瓦尔可能是他的俗称。至于作者的生平活动,也有许多传说:如有的说他出身于“瓦鲁瓦”的低级种姓家庭(所以名叫

“瓦鲁瓦尔”),祖祖辈辈当打鼓的,他本人也不例外;有的说他出身于织工的低级种姓,以纺纱织布维持生计等。从《古拉尔箴言》本身来考察,我们可以认为他是一位见多识广、思想敏捷、深通韵律的诗人,他可能是诗集的作者,也可能是诗集的编辑者。

《古拉尔箴言》采用泰米尔古典诗歌的体裁之一——“古拉尔”(又称“古拉尔文巴”)写成。“古拉尔”是一种双行诗体,第一行四个音步,第二行三个音步。这种诗体格律严整,不易驾驭;但作者却运用得灵活自如,得心应手,既有优美的韵律,又含深刻的哲理,因而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历千年而不衰。全书分为三篇:“德行篇”、“政事篇”和“爱情篇”。篇下分章,每章都有标题,三篇分别有38章、70章和25章,共计133章。每章包括10首诗,共计1330首诗。“德行篇”主要写的是在家人的道德标准和出家人的修行规范,以“仁爱”和“仁德”观念为核心(如“仁爱者必爱人,/亦为众人所友爱”,“仁德使人高尚和富足,/有何物比仁德更有益于人”);“政事篇”可以说是上一篇思想的延伸,既然为人要讲“仁爱”和“仁德”,那么执政自然要施“仁政”,于是颂扬仁政、谴责暴政便成为本篇的重要观点了(如“王者不施仁政,/苍天不降甘霖”,“横施暴政于民的君王,/必然迅速灭亡”)。“爱情篇”不仅歌颂爱情的幸福,而且提出不少有益的见解(如“幸福的爱情如同两端平衡的天平,/而失去平衡的爱情只有痛苦不幸”)。不言而喻,我们今天的读者仍然可以从中获得不少教益。举例来说,关于友谊的重要和交友的原则,书中写道:“人世间有何物比友谊更珍贵?/危难时有何物比盟友的援助更有益”(前者),“交友非为相互取悦,/只为失误时有忠言相告”(后者);关于提倡谦虚反对狂妄,书中写道:“高尚的品格在于谦虚,/卑贱的品格在于狂妄”;关于提倡勤奋反对怠惰,书中写道:“凡事切莫怠惰,/勤奋必然成功”;关于人品重于地位,书中写道:“人品低下者,身居高位亦不为贵;/人品高尚者,地位低下亦不为贱”;关于学识重于地位,书中写道:“不学无术的人即使

出身高贵，也不及出身低贱的学者伟大”；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四

印度人富于幻想力，善于创造寓言和童话。他们编辑的寓言和童话集很多，而其中名声最大、流传最广的无疑当推《五卷书》。《五卷书》不但在印度国内被译成多种方言，而且还在印度国外广泛传播。据译者季羡林先生介绍，早在6世纪便被译成巴列维文（中古波斯文），随后就通过这个本子传到阿拉伯和欧洲国家。有人统计，到1914年为止，已经译成了15种印度语言，15种其他亚洲语言，22种欧洲语言和两种非洲语言，每种语言还不止一种译本，有的语言（如英文、德文、法文）就有十多种译本。非但如此，《五卷书》的许多内容已经溶入欧洲一些著名的故事集里去，如薄伽丘的《十日谈》、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和拉·封丹的《寓言》等。在古代印度，这部用梵文写的寓言童话集最初究竟由何人编辑以及编辑的年代等已不可考。我们只是知道它的传本极多，有人把它们分为“简明本”、“修饰本”和“扩大本”等几类。在所有这些传本中，1199年补哩那婆多罗所编辑的“修饰本”《五卷书》影响很大，中译本就是根据这个本子翻译的。

《五卷书》分为五个部分：第一卷“朋友的分裂”，第二卷“朋友的获得”，第三卷“乌鸦和猫头鹰从事和平与战争等等”，第四卷“已经得到的东西的丧失”，第五卷“不思而行”。全书有一个总故事，每卷书也各有一个骨干故事，此外还插入许许多多的小故事，共同构成一个故事套故事、大故事套小故事的复杂结构。这种结构方式在印度可以说由来已久，是印度人喜闻乐见的形式。随着《五卷书》等书在世界上的广泛传播，这种结构方式也得到了广泛传播，并影响了其他国家的文学，阿拉伯的著名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便是一个力证。